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	1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关系	1
第二节 经管类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原则	16
第三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管类专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趋势	26
第二章 经管类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	35
第一节 经管类专业人才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研究	35
第二节 经管类专业人才道德素质的培育	39
第三节 经管类专业人才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61
第三章 经管类专业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91
第一节 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概述	91
第二节 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	93
第三节 经管类专业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99
第四章 工匠精神融入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104
第一节 工匠精神对个体发展的意义	104
第二节 工匠精神融入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方法	106
第三节 工匠精神融入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对策	115
第五章 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123
第一节 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123
第二节 我国会计人才培养的现状	126
第三节 会计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132
第四节 大数据时代会计人才培养新模式	165

第六章 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173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对工商管理人才需求分析	173
第二节 现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75
第三节 工商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途径	177
第四节 “互联网+”背景下工商管理专业跨界培养对策与建议	179
第五节 基于动态过程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182
参考文献	187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关系

一、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提出背景

从知识论上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分析，实质上“新常态”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也是历史特征的理论刻画与现实描述，它认识的对象是在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下形成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的特殊的情况之下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正常”现象。其中“正常”现象一词主要指的是在较长的时间之内发生次数较多的一些概率性大的比较普遍的现象。因而，对经济新常态进行观察和研究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段，有的时候也可以借鉴一些相关学者的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以一种宏观的全面的跨度较大的时间视角，观察对象未来可能发生发展状况，尤其是以往没有出现的新现象。

这是一个全球工业化的时代，人类处于这个时代已长达二百年。自 18 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工业革命，这三次工业革命以其独特的动力与性质，强有力地推动了各世界经济体的发展，并使得它们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以往，也有许多学者将其形象地称之为人类发展的“浪潮”。^①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发展过程是非常漫长和特殊的。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

^① 金碚.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01): 5-18.

（影响广泛但却颇具争议）就是从大跨度上对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大趋势、长轨迹进行观察，对长期收集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并作出初步判断。他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时期发生的特殊历史现象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工业化时期明显区别于其他任何时期的“新常态”。

工业革命的发展会直接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速度，以工业革命爆发之前的情况来看，人类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慢的，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经济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结束，经济高速发展的速度也不复存在。这就说明相对于工业化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低速或者中低速增长。

罗伯特·戈登（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世界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且所用的时间要比第二次工业革命少得多。乔根·兰德斯（挪威资深未来学家）在经过长期的预测与研究之后提出：在未来几十年中，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不再单纯追求财富，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经济的增长，到那时，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会逐渐降低，这将会反作用于全球的 GDP，从而使得它的增长停滞不前，甚至会开始下降。同时他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几十年间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的状态，且到 2052 年，相对于 2012 年，其经济总量将增加 5 倍，这意味着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将达 3.5%，由此可见，中国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态势就是这个时期的“新常态”了。

安格斯·麦迪森（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基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研究，发表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一书，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人口在 1820 年占世界人口的 36.6%，GDP 则占 32.9%，同世界平均水平（100）相比，其人均 GDP 为 90。中国在 1952 年占世界 GDP 的比例仅有 4.6%，人均 GDP 仅有 23.8。到 1978 年，中国占世界 GDP 的比例虽然稍有上升，为 4.9%，但是同世界水平相比，其人均 GDP 反而降低了，仅有 22.1。然而在 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 2006 年中国占世界 GDP 的比例已经上升到 15.1%，人均 GDP 为 73.7。根据安格斯·麦迪森对经济发展的分析与判断，中国这种远超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将会持续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与 1978 至 2003 年的增长速度一样快，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但是这个机遇的发生只有一次，中国经济不仅仅是受到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受到了外贸的影响，外贸的迅速扩张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以及高新技术，但是随着中国的技术逐渐与世界水平看齐，其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减缓。根据自身研究，安格斯·麦迪森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如下假设：2003 至 2030 年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率为 4.5%，但是其增长的速

度不会继续上升了,而是会逐渐降低,2003至2010年有5.6%的年增长率;2010至2020年则是4.6%;2020至2030年就仅仅略高于3.6%了。根据上述假设,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将会与1990年的西欧持平,或者是达到1986年日本的水平。一旦接近那种水平,经济发展对技术的要求也会提高,成本就会随之上升。进入2030年,世界领先的技术还将进一步外移,这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留下了赶超的空间与余地。

在上文中,所列举的一些国外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状况的预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国外和国内的一些统计方式和人口数量的不同,其具体的数据肯定是存在差异的,但是他们做出的基本判断与所描述的历史轨迹在大体上还是相同的。很多学的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在不断降低,总的来说,不管是从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研究和分析人类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是以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都促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势态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但是事实上,即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或更低,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和其他国家相比,也完全可以称为是“中高速”或“高速”发展。由此,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一种视野的开阔与心境的常态,是长期视角与平常心态下合理预期的经济增长大趋势。

(二) 新常态的内涵

虽然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周期特征这一重要概念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是中国首创,新常态一词最初的提出者是美国华尔街经济学家。2009年年初,“New Normal”的概念首次被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利安与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在“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的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提出,这一概念是用来概况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经济可能遭遇的长期、缓慢且痛苦的恢复过程。新常态概念的再次提出是在2010年举行的“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该年会在瑞士的达沃斯举行,在此次会议上埃里安对美国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状态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及了新常态,这引起了会议参与者的热切关注。^①根据实际的数据统计来看,新常态一词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上经常出现,在2002年每月平均出现的频率为50次,在举办“第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的第一年(2011年)新常态一词平均每月出现了700次。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美国经济学家研究的新常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相同之处在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面临压力,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而其差别则表现

^① 高萌.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劳动力要素特征研究 [D]. 吉林大学, 2015.

在多方面。首先是美国经济学家理解的新常态可能是指存在的失业率增高、经济增长率降低、金融风险攀升等风险。而中国学者与领导人所表述的新常态则是指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出现的新条件、新机遇、新失衡等，以及通过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较长期且稳定的特征，来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与决策。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充分认识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了解并总结产业、进出口、投资、人口、消费等方面的最新情况，并充分保持政策平常心与耐心，以将经济发展的活力激活与经济增长的潜力挖掘，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在任何阶段都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最终实现全面转变与调整增长动力、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达到社会、民生与经济共同健康持续发展的目标。其次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策导向的不同。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其应对政策是防范金融体系的过度风险与自由，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期则是通过加强金融的监管来推动经济复苏。而中国在步入经济新常态后，则是使用多样化的政策手段进行调控。一方面将经济社会改革继续深化，其手段为减少审批、简政放权、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将法治建设、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推进，同时对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建设加强，将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市场竞争力充分释放；另一方面，把增长动力与方式转变，鼓励创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加强、“第二次人口红利”释放，以将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持续提升。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和机遇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在河南考察时，首先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并站在决策者的角度，用新常态一词来形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特征，之后又在亚太经合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明确了新常态的三大特点，首先，在速度方面，新常态即放缓经济的发展速度，由经济的高速增长转换为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其次，在经济发展的结构方面，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最后，是从动力方面来看的，主要是指的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为要素驱动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九大趋势性变化。第一，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第二，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

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这九大趋势性变化高度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全面深刻认识，是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表面上经济增速降下来，但实质上是追求更有效益、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是夯实我国经济发展之基的重大战略布局。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三期叠加”阶段，向高效益、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种新的时期特征会成为一种常态并且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与经济旧常态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宏观调控、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以及增长速度等方面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1.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变化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受到高品质消费的主导，所以导致提质增效升级的供给与新需求结构逐步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的表现如下。

其一，内部结构升级，投资结构占经济总结构的比例减少。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现阶段，虽然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断降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由于我国的人均资本的总存储量本就不高所造成的，所以投资或资本累积还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投资的重要性不会轻易地改变，但是会逐渐从改变投资的性质方面出发，将一些非民生性质的投资转变为民生性质的投资。也就是说，将投资需求结构从重工业、房地产和一般的基础设施逐渐转变为现代农业、棚户区以及城镇化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工程上转变，这一改变同时也证明，我国将逐渐重视高新技术的作用，并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在投资方面更加注重投资的成效以及

质量，不断重视民间投资的作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政府投资。

其二，内部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占经济总结构的比例增加。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倍增与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促使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其主要体现在人们的低品质、低收入、低支出需求转型为高品质、高收入、高支出需求，多样化、个性化与智能化需求将成为主流。此外，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升。

其三，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推动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又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随着中国资金丰裕程度的提高、科技水平的进步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知识与资金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同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消费结构对应的是专业化、智能化、小型化的产业结构，这也是产业组织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的特征之一。

其四，现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应该要深化改革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加大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采用顶层设计的方式来打造个“一弓双箭”的格局，其中“弓”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京津冀经济圈；“箭”为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2.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方面

中国经济在面对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时，应该对宏观调控新思维积极探索。首先，调低不同主体的预期。政府还应该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要注意不断调整并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进入与环境和谐相处，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经济。与此同时，也应该尽可能地摆脱对GDP的依赖程度，企业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应该转化盈利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规模扩张上，而是应该将技术进步转变成核心动力。此外，民众也要将投资收益的预期调低。其次，调整宏观政策体系。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重要原则是注重供给和需求管理的统一，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财政政策应用方面，要将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转变。在短期宏观调控方面，结构性减税应作为主要的财政政策，同时要通过给企业制定一些补贴性政策来降低其成本。但是对于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与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政府则应将政策进一步收紧，以促使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在融资方面也应该创新更多的政府融资新方式。第二，在货币政策应用方面，经济发展新常态也促使货币政策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逐渐从宽松型的货币政策转向为稳健型的货币政策。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应用与以前的总量刺激有区别，采取大幅宽松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当前经济增速的放慢属于结构性下行，因此定向降准应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同时引导和鼓励金融结构更多地把信贷资源配置到与现代服务业、小微企业、“三农”等发展

比较薄弱的环节以及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优化结构，并保证总量的发展。第三，在产业政策应用上要从低增加值率向高增加值率转变。通过市场竞争淘汰一些过剩的产能与落后的产业，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实现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共同发展。在传统产业方面，其经济模式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现阶段经济新常态发展下，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其与传统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在加工贸易上，要注重扩大品牌影响力，加快研发速度，提升营销服务能力，并将重点放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上。第四，创新机制体制的改革，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要通过产业转型与创新机制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当前，我国经济的机制和动力正处于转换时期，各类风险与矛盾日渐突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创新驱动动力，基于产权制度来实现创新机制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并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资源配置的相关发展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并进步转变政府的相关职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场的活力。

3.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动力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是创新。尽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改革创新的红利、人才创新红利、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技术创新的红利五大动力，但技术创新还是决定经济成败的关键，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创新驱动的根本在于技术创新，它是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且无限接近于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其模仿与学习的可能性就非常之低了，这个时候想要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与高素质人力资本。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 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机遇

第一，会迎来经济调整 and 改革的机遇。目前，中国积极高投资带来的高污染、高能耗、创新不足、社会经济冲突、收入分配差距等都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富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绊脚石。国家领导人与经济学者、专家也深刻认识到，必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大调整与大改革，这种“大调整”和“大改革”共识的形成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一轮的礼物，也使得中国在世界性经济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获得了良好的机遇。

第二，会迎来大市场和大消费的机遇。当前，中国 GDP 稳居世界第二，消费规模与

市场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显示“大国经济效应”。首先是市场规模效应的出现，同时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其次是消费方面，中国每年消费规模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并开始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最后是“世界市场”与“世界工厂”之间开始实现对接，且内外贸易实现一体化，这些都加强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

第三，构建多元增长极与“大纵深”的机遇。当前，虽然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地区已全面向服务业转变，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依然处于发展中期。这除了为中西部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还腾挪出了空间给东部产业的升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产业转移既延缓了工业化红利减少的速度，又通过多元化的增长手段优化了中国经济的空间布局。

第四，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和“大人才”的机遇。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速，传统人口的红利已经消退，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用工贵”与“招工难”的问题愈发突出且集中在农民工领域。我国的就业格局由“民工荒”和“学生就业难”共同组成，且农民工的薪资已经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工资拉开，这是因为每年大量的学生毕业给其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这也恰恰证实了我国开始从人口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本强国”，并且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开始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先决条件。人口红利也开始转型，即以低端劳动力与农民工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向以人力资源与学生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转变。

第五，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和“大升级”的机遇。中国经济在人力、技术与市场等多方面的作用下，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消费也逐渐开始大幅度改变，从过去的工业化消费向后工业化消费转型，其中工业化的主体是吃穿住等行为，后工业化的主体是服务消费与高端制成品；其次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雏形开始显现，在产业需求的拉动下，制造业开始大幅度地由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第六，中国经济全球布局和“大开放”的机遇。首先是中国的“商品输出时代”转向为更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且海外并购的速度加快，平均速度超过了30%；其次是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被全面强化，其主要是受到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影响；再者是将“一带一路”作为展开开放战略与空间战略全面对接的核心，并使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将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打造；最后是通过构建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来将欧美统一国际金融的格局打破。上述扩展必然会将中国经济发展带入新的阶段，因为其有效地扩张了中国的盈利模式与资源配置空间。

2. 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可观，但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够。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来看，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就经济发展速度来说，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呈现年均两位数的速率（世界少有）高速发展，创下了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为财政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而社会和经济存在的薄弱环节、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切实改善、自然灾害与风险的有效应对都需要资金保障。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实能够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同时经济发展的红利也会不断提高。但从客观上来说，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现象十分明显，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挑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正常运行。

第二，尽管经济增长动力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依旧缺乏核心动力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其回旋空间更大、潜力更足、韧性更好。首先，从城镇化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处于世界前列。同时，城镇化过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将带动消费的增长，并最终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次，从工业化角度分析。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距离完成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如今仅有东部部分省市的工业化基本完成，西部、中部等地区的工业化还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同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创新能力提升、科技体制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诸多方面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与依靠“技术红利”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三，尽管发展的前景愈加稳定，但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还面临许多困难。前四十年，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其中投资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在内需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当2010年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比例持平之后，消费率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在经济结构中超过了投资率，这个时候就逐步体现了投资的关键性与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受到历史文化、发展基础与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区域性的特点，主要呈现为中、西、东部的发展差距较大。但是我国直面挑战，制定和实施了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这使得区域经济结构逐渐得以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红利”。但是，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等还需不断调整与优化。

第四，尽管市场活力得以释放，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需加倍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核心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为了完善相关机制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开始注重改变自身职能、简政放权。虽然这些措施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并非所有地区的政府职能工作都做好了，还是存在很多腐败、吃拿卡要、“红顶中介”等过度干预企业经济的现象。因此，加快法制政府的建设与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制新常态下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三、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协同发展

（一）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1. 协同理论

经管类专业教育要想与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就必须对协同理论的基础概念进行充分理解。下文就对这些基础概念进行详细描述。

第一是“熵”。简单来说“熵”是系统中度量无序状况的值，主要是表明信息系统的一些不确定性，无论是何种能量，在空间汇总的分布越均匀，其熵就越大。

第二是“涨落”。主要是指某一物质系统，在平衡状态的时候，一些关键参量如气态物质的压强、分析数密度等统计平均值在实际值附近上下波动的现象。一般情况下，这种波动的范围有限也即涨落的范围是很小的，但是对于某些关键值的涨落还是会影响到系统整体。

第三是“序参量”。这一数值所针对的是一些控制参量，当这一数量发生改变时，或到达阈值时，例如致使水发生改变的溫度、气压等，能够对整个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系统的整体状态，这些参量即是“序参量（E）”。这也同时表明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集体变量来描述整个系统的动力状态。

第四是“耗散结构”。它就是指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宏观稳定有序的结构，也就是某个与平衡状态远离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不断的同外界的能量与物质发生交换，使系统内某个参量变化至一定的阈值，这时系统会发生涨落现象，并进一步发生非平衡的相变，使得系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时间、功能、空间上的有序状态。

第五是“耗散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普利高津发明的，主要是解释外部环境中所

存在的某种交换开放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中，两部分之和表示的是熵（ dS ）的改变，即 $dS=deS+diS$ 。而对不与外部环境存在任何交流的“孤立系统”来说，其最终的走向则是逐渐无序，不会有耗散结构的出现。对公式 $dS=deS+diS$ 进行分析，当外部环境和系统之间的负熵流（ deS ）比系统内部产生的熵（ diS ）大时，系统的总熵则呈负值，这就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系统内部的总熵的数值会逐渐减少，这一数值的变化也就表明系统开始走向有序化。因而，总的来说，开放性的系统能够从外界获取一些负熵来抵消本系统自身所产生的熵，从而促使系统进一步稳定有序的发展。

将其具体应用到新常态经济与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发展当中去，经管类专业教育也应该不断展现自己的优势，与当地的教育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当地经济产业等各种外部的社会系统进行能力的交换，从而通过政府指导以及校企合作等“外部控制参量”来扩散涨落，促使经管类专业院校内部实现结构的“相变”。在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这两个系统中，序参量可以是社会需求融合度、新常态经济产业结构与经管类专业教育体系的数量上的变化，会促使社会、科技、教育、经济以及生态等各个环节实现协调统一。^①通过协调理论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发展进行分析，其能够促使政府更好地协调运用社会资源，从而保持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保持协调统一的关系，推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 劳动力市场相关理论

（1）人力资本与教育筛选理论

新古典主义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工资的多少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y*）决定，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是同质的。教育是人力资本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企业对职业教育进行投资是有很大的回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常态经济下的些产业是能够和经管类专业教育很好地进行合作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也能够提高各项技能，同时，企业也是作为经管类专业教育的服务接受者与受益者，也应该对其投资，并积极参与开发专业与课程。

教育筛选理论的工作竞争模式被提出是因为有许多学者开始对劳动力同质理论发出了质疑，教育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工作机会的分布也会影响人们收入的变化，且劳动力市场是能够调整训练阶梯与可能训练个体之间关系的市场。那么应该怎样使用最低的培训费用投资呢，又当如何来训练并选择工人期望获得的生产率呢？在

^① 王耀华. 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D].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12.

这些疑问之下，教育就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装置，主要用来区分适合被训练的人群，也是教育和培训就被工作岗位强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经管类专业教育就成为这些人眼中获得较高劳动力的门槛，因为它须发的专业与学历证书能够筛选出一批优秀的人才。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协同合作的价值就体现在企业对经管类专业教育本身的充分信赖，或者说能够在经管类专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中招聘到质量较高的劳动者。这种对劳动力的有效筛选，就导致经管类专业教育出现“为教育而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倾向，毫无疑问这与当前经济产业对教育的要求不相符。

（2）二元劳动力市场与三部门理论

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主要分为两类，即维持生计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前者主要指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边际生产率比较低；后者指的是现代工业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比维持生计部门要高，因为它的技术比较先进。但是，随着现阶段资本主义部门不断发展壮大，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的的劳动部门也流入了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在其著作《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再论二元经济》中提出，这两个部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二者中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非正规部门，托达罗认为城市的经济部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规部门，另一种是非正规部门。正规的经济部门主要是指，从事一些规模较小的生产活动的部门，大多数是家庭所有的，且一般技术比较简单，统一操作，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同正规部门、农业部门的联系较为紧密，主要是因为其不仅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步入城市，摆脱实业，还向正规部门提供生活必须的廉价品。同时我国著名的学者朱镜德还把三部门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分别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对于经管类专业教育应用于新常态经济的服务应该由相关市场部门先进行明确的定位。我国的学者陈卫民和辛怡等认为职业教育（包括经管类专业教育）所面对的市场是比较特殊的，其面向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全的竞争劳动力市场。在我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中，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总的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比较高，因此，其就需要更多的培训以及教育的机会，因而，在这一劳动力市场中需求更多的知识结构，来适应其自我发展的要求。也是由于这一原因，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发展也向着更高更苛刻的目标发展。

3. 教育产权理论

产权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主要是指财产所有权，产权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

了占有权、使用权、消费权、出借权以及用尽权等与财产密切相关的权利。是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上，的完全的权利。一般来说，如果产权较为明确，其实现过程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也会比较清晰。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中曾经提出，要不断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结构以及布局，同时促进公有制经济实现多种形式的发展，在以多种形式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时候也要注重与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促使投资主体更具多元化，并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应该建立一个权责明确、归属清晰以及流转顺畅的现代化的产权制度。就经管类专业教育的产权而言，是其客体拥有的支配权、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处置权和收益权等的总和。因而，为了维护经管类专业教育的产权权益应该要建立一整套较为合理的法人制度，以更好地推进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内部管理发展。

在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一般法《民法通则》中将法人单位主要划分为三种，这三种分别为企业法人、法人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法人。其中相关院校可以归结到事业法人单位中，因此，学校也必须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另外，在我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出资人的相关事项，即其能够通过办学，并从其结余之中获得一些合理的回报。这也就为一些民办院校获得合法收入提供了相关依据。厉以宁也认为，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冲突下的教育产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准公共产品。对于非营利性的相关界定也有其特点作为依据，首先，组织获得的相关利润是不能够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其次，在组织的宗旨中必须要体现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主题；再者，组织的资本是公共资本，不能通过任何形式转化为私人财产。因而，从这一法律依据中也可以看出，只要在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并且不将资产转为个人所有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民办教育还是公立教育机构都可以为受教育者们提供一些私人产品性质的服务。这也就意味着相关院校和企业开展具体的合作是具有平等合法性质，也有利于促进相关院校的发展与新常态经济发展互相融合，共同促进。

（二）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协同发展的途径

1. 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制度协同

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协同创新需要新制度安排来规范与引导各类主体行为，并需要制定与完善与创新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促使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双方之间的协同合作的关系。这样一来同时也确立了双方的责任边界以及合作的利益范围以及合作动力等，也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合作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危机和利益冲突，从而形成经管类专业教育与

新常态经济协同发展共同创新的动力机制。

首先，是合作模式上的创新，建立一个校企合作的长效合作机制，增加相关院校和企业之间在专业设置、实践教学以及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逐渐实现“四个合作”的办学总目标。确立一个合作育人的发展模式、以合作发展为主要动力、合作就业为主要导向以及合作办学为基本体制的发展模式，要不断展现自己的院校优势，吸收更多的企业以及社会力量等进行合作，促使企业、产业以及行业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促使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质量向纵深发展。

其次，是政府管理经管类专业教育模式上的创新，主要指的是不断完善相关院校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体制机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经管类专业教育的作用，推进经管类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互融合在一起。相关立法部门可以采取立法的形式，让政府、企业以及相关院校三者之间的职权更加明确，同时政府也应该在政策上给予经管类专业教育更多的倾斜，加大对经管类专业教育发展的投入力度，积极在政策上推进校企结合的发展模式。在校企结合发展模式，政府要发挥其中间人的作用，促使企业内部的相关部门确立人才的需求机制，并引导相关院校专业设置的适时调整。^①

最后，是经管类专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创新，即经管类专业教育发展应该走积极的自我调适的道路、探索与企业以及政府共同发展之路。其一，相关院校要积极进行办学形式的创新，在发展传统的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前提之下，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加强对一些专业学生的职业技术培养力度，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适应经济新常态下对人才的发展需求；其二，相关院校要不断优化自己的专业结构，了解经济新常态下的各个行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设置一些市场需求的专业，培养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其三，也要加强对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技术服务能力与产品研发能力。

2. 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组织协同

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的协同创新，主要是指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创新平台，促使合作主体的资源以及创新要素相互融合在一起，从而巩固合作关系。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相关院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即教育集团。并善于利用这个平台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新要求、新方向、新动态反馈给相关院校，从而使其建设的专业体系紧随新常态经济机构的发展，为社会、企业、行业等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

^① 易小芳. 新常态下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创新 [J]. 教育与职业, 2015, (27): 9-13.

首先，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科技研发中心，设计这一研发中心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存在的技术难题，为其提供更多技术方面的支撑。一方面，相关院校引进企业以及行业的科技研发队伍，共同构建一个研发机构，能够更好地促进自己院校的人才就业，同时开发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另一方面，相关院校也能够自己组建一个专业的研发团队或者工作室，以做项目的形式进行科学研究。

其次，相关院校也可以建设一个创业基地，并构建科技研发中心，鼓励学生积极创新，并为教师研发新技术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样也能够为企业输送更多的高质量人才，从而发挥经管类专业教育的作用，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最后，相关院校综合性创新创业基地的建设。经管类专业教育的发展目的是为企业、行业、产业提供实用型人才，且服务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就需要政府主导规划建设，企业、社会与学校广泛参与建设创新创业基地。使用深化校企合作的手段来重建课程体系、保障体系与实训体系，培育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同时将师资队伍素质提高，搭建产学研用的平台，最终实现经管类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零距离对接。

3. 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环境协同

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的协同还包括了资源生态环境的协同，主要包括了外在相关政策性的优质软件环境。在资源生态环境这一方面来说，是要极大程度地发挥经管类专业教育的智慧，科学合理地评估生态资源的承载力，从而以此为基础，作用于新常态经济的发展。

首先，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要一起合作、一起发展，冲破资源与环境的限制，不断规范开发新的秩序，合理地控制开发强度，有偿使用资源，与环境和谐相处。相关院校虽然不是营利性的组织，但是其仍旧具备公益性的特点，因此，与其进行合作的时候，不能忘记保护环境意识，要做到共享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技术共享，同时在合作研发机构形成一种环保的文化氛围。

其次，要发现更多筹措资金的渠道，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地方政府要不断完善财政资助制度，且县、市政府对相关院校拨入的财政资金多少应该根据其发展的规划来确定，但是各级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相关院校，可以通过进行科研合作，以及开展一些培训等形式来融资，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持允许并支持的态度；同时政府也应该制定一些投融资以及税收等的优惠政策，最大程度上鼓励企业积极地参与相关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大力进行技术方面的创新和发展。

最后，在人事管理上也要不断寻求创新，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协调部门，专门负责

校企合作的协调工作，并对相关院校的办学条件以及人才培养方式进行评估和检查，同时要积极地鼓励科技人员的合理流动，制定合理的科学的人事政策，并保持畅通的渠道，促进科技人员的相互流通，以保证科技人员在流动期间的待遇和福利。

第二节 经管类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原则

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结构同步

新常态院校承载着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大历史使命，所以选择正确的经管类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不仅是新常态经济发展对经管类专业教育有效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还是经管类专业教育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与质量的重要保障。经管类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结构同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具体原则。

（一）紧扣新常态经济发展“产业脉搏”的原则

首先，新常态下，专业的设置与建设应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相关院校服务于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原则是：专业设置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地方相关院校不仅要紧扣经济发展的脉搏，更要紧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并根据区域新常态经济中的人才规格与产业发展需求，同时围绕新常态下的各种新兴产业以及特色产业的发展，来设置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相对应的专业，并通过这一契机打造产业集群化、农业现代化、区域信息化等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专业群。另外，相关院校在专业建设上要做到灵活调整、积极主动、自由开放，以便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相关院校的专业设置也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促使其迈大步、扎稳根。

其次，课程的开发与改革要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岗位需求进行有机结合。相关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与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密切相关，因此，相关院校课程改革要基于新常态加大课程开发力度。通过采取“产学研”相结合、校企合作共同发展的办学模式，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新常态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是课程设置应该重点考虑的因素，要多开发一些实践类的课程，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同时，课程体系的建立必须摆脱学制的束缚，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作为重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课程

评价体系方面，要以学生的职业能力作为主要标准，推动课程标准与行业标准的有效对接，最终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既满足企业需要又适应岗位需求。

最后，人才培养模式与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基于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时代的新要求。经管类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可以从深化“产学研结合”“工学交替”“订单培养”等方面开展。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包括建设和共享实训基地，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中更多包含企业对人才的满意度等，并力图建设一个以政府主导、学校为核心、社会各界以及企业一同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相关院校若能够遵循人才培养适应于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则，并将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作为主要目标，就必然能够将新常态经济的结构升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国家竞争力提高。

（二）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同步发展平台扩宽的原则

第一，在扩宽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同步发展平台的原则中，连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纽带是教师。经管类专业教育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学生“多证书制度”推行的实施者就是“双师型”教师，他们是新经济常态下院校就业与招生的重要桥梁。相关文件也曾明确规定，院校在校企合作模式教学下要落实好教师与企业的责任，鼓励、支持和引导教师进行技术创新，并充分利用创新成果为企业和社会服务。为此，教师应该主动进入企业进行实际操作与锻炼，树立实践意识与服务意识，并积极投身于新常态经济的建设。相关院校可以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具备现代教育理念、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专兼结合，且与新常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第二，在扩宽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同步发展平台的原则中，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共享平台是实训基地。院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统筹协调的作用，有效整合市场、企业与学校各方资源，继而建设一个区域共享型的实训基地。这样一来，实训基地既可以针对新员工进行业务培训，又能够及时有效地推出一些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培训产品。与此同时，对于不同需求的人群可以提供不同类型和个性的培训服务，如针对企业管理阶层进行提高其市场经济能力的专题培训；为企业基层员工或业务新手进行岗前培训等。总之，就是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通过实训基地为不同类型的员工提供灵活多样、形式丰富的服务与培训，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此外，相关院校还应积极发挥引领示范的作用，公平有序地将实训基地对每一位需要的学生和教师开放，更好地让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相关院校只有始终坚持扩宽经管类专业教育与新常态经济同步发展平台的原则，才能使相关院校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摇篮，成为校企合作的载体、社会教育与服务